

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

■ 李海萍

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 2024 年 4 月~7 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继党史学习教育后,我党又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教育。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始终是我党高度重视的内容,马克思曾说“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中央提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正当其时,很有必要、意义重大。

党纪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全体党员干部在各方面约束自身行为的准则和遵循。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就是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效捍卫党的团结统一,凝聚磅礴力量,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一、“学纪”是前提
学习党的纪律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第一步,也是基础。大量事例说明,干部出问题,都是对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不足。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学习、不了解、不掌握,甚至不重视、不上心,当纪委“登

门造访”时才幡然醒悟、追悔莫及。因此,对待《条例》要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习,理解其精神实质,把握其核心要义。弄清楚党的纪律要求有哪些,行为原则是什么。通过对党的纪律的学习,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入脑”,把遵规守纪印刻于心。各级党委要加大对《条例》的教育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各种有效的党纪读书班、专题学习班、座谈会、集体研讨、比赛活动等,推进党纪教育常态化,营造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习《条例》。

二、“知纪”是根本
知纪不仅仅是对文字规定的了解,更是对党的纪律精神、纪律原则、纪律要求的深刻领会。知纪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更要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深层原因。把每一条党的纪律规定搞清楚,把为什么修订《条例》、修改了《条例》哪些地方、修订《条例》背后的考量等都弄明白,做到学深学透

学到位,校正思想和行动,将《条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真正使学习党纪的过程成为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只有党员干部清楚知道党的纪律,严格按照党规党纪的具体要求办事,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严守党的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通过知纪,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做到言行一致,为明纪、守纪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明纪”是重点
明底线方能知敬畏。现实中依旧存在一些党组织对纪律建设重视不足、措施不力。一些党员干部“目中无纪”,把纪法教育当成“耳边风”,对党纪党规缺乏敬畏,我行我素。更有甚者知纪违纪、知法犯法,党纪党规的刚性和严肃性受到严重的挑战。明纪是党员干部对党纪规定的目标和要求有明确理解和清晰认识,清楚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时时刻刻在心中严明党的各大纪律,并严格按照党纪党规要求办事。明纪要求党员干部在面临复杂情况、重大选择时能够坚守党的纪律底线,不为私心所动、不为利益所惑。党员干部应对照典型违纪违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时刻警醒自己。把党纪党规当成自己的“高压线”“警戒线”“紧箍咒”“护身符”,做到明底线、知敬畏。各级党组织也应以严的基调,将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检视整改,督促党员干部。将执纪执法有效贯通起来,切实维护好党的纪律的刚性、严肃性。通过明纪,党员干部能够

在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公正无私、为守纪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守纪”是关键
自党成立以来就特别强调对纪律的遵守和执行,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两个务必”“三个务必”,我们党始终坚守纪律的底线,始终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守

出了新中国,守出了新时代,守住了江山,也守住了人民。首先,守纪要求党员干部守住“权力关”。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为人民谋福祉,用得不好则会损害党的形象和群众利益。党员干部应用党纪时刻警醒自己,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滥用权力,不谋取私利,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其次,守纪要求党员干部守住“交往关”。党员干部要谨慎交友,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要警惕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坚持纪律原则,守住纪律底线,做到公私分明、廉洁自律。此外,守纪要求党员干部守住“亲情关”。党员干部应注重家庭教育 and 家风建设,引导家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做到公私分明、不徇私情。通过守纪,党员干部才能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and 尊重。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应严格按照党中央要求,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用党规党纪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 赵 玲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成为可供中国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榜样。只有学习和借鉴马列主义,才能在中国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四川地区的有识之士也勇敢地加入了这一传播阵营,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一时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对巩固中国思想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新时代青年应当铭记历史,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加深对四川地方历史的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承红色精神,践行美好传统,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美丽章。

一、五四期间马列主义在四川传播的历史背景
1917 年以后,四川各路军阀在政治上无情地统治、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四川社会陷入黑暗和混乱,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四川人民被迫寻求新的出路。五四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巴蜀大地上出现的一股马克思主义“春风”,给处于黑暗和混乱中的四川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它开启了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为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和可能,使民众的思维得到了更大的解放。而留法勤工俭学在四川的积极开展,也给了一些有志青年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在这种背景下,四川地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二、五四期间马列主义在四川传播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经历了四个阶段:初步传入、大力发展、有组织地传播和传播受挫四个阶段。尤其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传播的历史进程得到了发展、深化和扩大。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的逐步加深,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论战的影响,活跃在四川的吴玉章、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帮助成都、重庆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带领他们行动起来,积极引导、开展实践教育和争取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际工作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走进了四川民众的视线,让他们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之光。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对当时四川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界也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的真理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特点,最终替代了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四川继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

三、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比较
(一)马列主义传播主体的比较
纵观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在传播主题上有四个特点。第一,四川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水平还很低,因此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来源主要来自川外。第二,宣传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第三,宣传者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独立性,宣传影响十分有限。第四,四川还没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报纸。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当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较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普遍较为浅显,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片段的选译,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理论深度和深入研究。然而,五四运动后,四川出现了一股学习新思潮的热潮,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内容也逐步丰富,基本覆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几个重要领域,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巴蜀地区出现了一批具备初具共产主义意识的四川知识分子,他们探索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四川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比较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媒介主要以新式报纸及书刊为主,而五四运动后,四川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了较大的进步。

1.创办进步报纸杂志。五四运动后,四川报纸和期刊迅速发展,《人声》和《短刀》等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刊物也相继涌现,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2.发展书报流通处。五四时期,书报流通处是引进川外的进步报刊的重要途径,以成都华阳书局最为有名。
3.创办进步组织。五四运动前,四川还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五四运动后,四川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成都总工会等各种先进的组织,来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
4.改革教育。四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意识知识分子的教育活动密不可分,而五四运动后,推动教育改革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的一个重要支点。

四、五四期间马列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立国之本,是全党精神之魂,是全党的旗帜。”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兴衰。一百多年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四川人民才真正尝到了真理的甘甜。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法论。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这对于在新时代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群众动员和教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实践理路

■ 路羽秋¹ 周欢²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完善乡村治理的实施意见》,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和深远谋划。这两份文件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清晰的目标指引,也为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只有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才能确保乡村振兴的顺利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同时,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能够相互衔接、形成合力。

一、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重要机理
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确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乡村振兴不仅关乎农村经济的繁荣,更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农民的生活品质紧密相连。有效的乡村治理能够极大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乡村治理能够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乡村治理还能够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理论层面来看,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通过深入研究乡村治理的模式、机制和效果,我们可以为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对策

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实施,加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人员的工作热情,让人们自觉自愿地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政策。在自身加强的同时建立基层组织领导以及村民参与监督的目标考核机制,将考核项目和标准公开,便于对政策贯彻落实实效进行评判,同时建立考核个人能力的奖惩制度,并让其与绩效和奖金挂钩,用成绩折算利益,激励乡村管理人员做实事。有了奖惩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约束,能够有效提高基层治理人员工作实效和效率,使乡村治理政策及时有效落实。

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第一,让村民通过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获得利益,乡村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乡村产业发展和政策实施,积极引导村民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和相关惠农、利农、便农政策,抓住发展机遇,实现改善生活和增产增收的愿望,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从而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工作;第二,通过教育和宣传演讲等措施,促进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培养村民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增强村民对村集体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打造和谐有序发展的乡村社会,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满足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加强治理体系建设,在乡村治理中,推进“三治融合”,要合理加快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施步伐。首先,必须以自治、德治、法治三治为乡村治理基础,保障村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知情权等自治权利的实施,让村民积极行使自身的正当权利,表明自身诉求和发表相关意见。其次,学习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重视德治教育,在农村培养道德模范,强化道德标杆的引领作用,对其进

行表彰和宣传,组织村民进行学习。最后,为了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我们必须加强普法教育,要确保农民充分理解并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够建设一个法治意识深入人心的农村社会,并引导农民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矛盾和纠纷,打造自治有序、法治有据、德智有礼的和谐乡村社会。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抓住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大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居民打造更加舒适安全和有利于参与乡村治理的环境。同时,要重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利用大数据分析乡村社会经济状况,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建立乡村治理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提升治理精准度,通过更便捷的方式搜集乡村发展相关资料,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乡村治理成效。

加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要使乡村治理成为现实,需要农民展现行动能力,认识到他们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引领村民充分认识到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参与乡村治理转变为自觉自愿的行动。让农民能够以有效、正常的途径参与乡村治理生活。其次要了解农民的需求,充分尊重农民的观点,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使农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以治理工作为己任。最后,疏通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设施将进一步推进,移动网络,微信群等工具更加普及,加以运用广播、信息、会议等形式辅助,增加村民获取信息的机会,及时有效地参与乡村治理活动。

(作者单位:1.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2.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孟子心学思想中的“求”之工夫

■ 赵志刚 栾翔宇

孟子的哲学思想以性善论为起点,以心善即是性善,阐发出孟子独有的心学思想。孟子之心以本心良心为统摄,而其需要扩充存养,才可让本心之用得以完好运转,使得人心善性,知命事天,而其扩充存养之法便是孟子心学中的工夫学说。其工夫可以实行的前提条件是本心良心在其身中,人便会依着此心去做知行,便会自然而然行扩充存养之工夫。此番工夫便是孟子心中积极的一面。而若是本心良心不在,其在并不是说人不具有此心,此心人人具有。只是因为人不擅长存养之工夫或是外界之干扰,将其本心心所遮蔽或是放失,又要如何作工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便要失去本心之心,去作“求”之工夫,寻求自己的本心良心。

一、“求”之工夫的核心为“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句话显示出孟子的“求放心”工夫,即当人的本心良心放失之后,人应该作“求”之工夫。这也就给人一种指向。人们所求之物是那本心良心,规定了其工夫的方向和目标。而此方向目标,一定不掺杂着“利”,即我之所以去“求”那放失之心,不是我为了我自身人格完善而去求,不是因为此心对我自身有利而去求,而是本心良心引领我自愿去做此番“求”之工夫,不为利所求,不为己之完善所求,仅是人与本心相互招引。在此之中,便体现着“义”。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在孟子这里,义被看作是一条符合人性的道路,一条正确的道路。正如孟子所言“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爱人依据仁心,行事遵循义理,是大人做事的准则。当心放失于利欲之中,人们去求时,其行事开始遵循义理,羞恶之心开始扩充,义从心生,招引着人向着大人的目标前进。“义”的内涵有人做应当做之事这一层意味。我之本心良心放失,本应当我去求之,这必然表示着“求放心”是一种义行。而当做义行之事,仁心也必然伴随着生发出来。因此,求放心这种找回放失之心的

行为,是最能表达义的工夫,即“义”为“求”之工夫的核心。
二、“求”之工夫的具体实践
“求”之工夫的指向是本心良心。实践此番工夫的第一步是“知”或“自知”,即知了我心之放失,才可以进而求之。孟子曾对其弟子公孙丑说过,他所擅长的两件事是“知言”与“养浩然之气”。何为“知言”?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对于不当的言辞知道其原因所在,便是知言。言为心声,知其言,便可知心之所思所想其不当处。自身做到知言,便对自身所思想着有深刻的理解,便可知其心是否放失。若是放失,去求便是了。因此,求放心之工夫需要先做到知言,才可能进一步开展实践。

知了心之放失,人便会去求心,要去求心便需知晓“心”因何而放失,找寻“心”放失于何处。这就需要“求”之工夫的第二步,“反”或“自反”,即反身而寻,反身而求。孟子曰:“爱人而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正而天下归之。”当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时,便需反省自己。在“求”之工夫中,亦是如此。当去求放失掉的本心良心却求不到时,就应反省自身的言行是否真的符合求放失之心的言行。若是真的,就必然会主动探寻“心为何放失”与“心放失何处”,得其心声,心声即为答案。“自反”工夫需彻底,需要为真,才能追问个答案来。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自反要做一个“诚”字,不可自欺,不可作伪。反身是知言的进一步实践,是以真诚之态度反观自身种种行为,求得心之为何放失种种。上述自知、自反皆是以最直接的感觉去行事,去实践。而这种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本心良心逐渐找回或浮现之迹象,即为“得”或“自得”。孟子有言“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表明本心的求得最后是由自身而界定。若是求得本心,便不再再做“求”之功夫,转而去做养心尽心的工夫。若是未求得,便继续反身而寻。只因万物

皆备于我,只因求在我者,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孟子这里被发挥到最大。由此可见,自得作为“求”之工夫的最后一步,是自知自反的进一步深化,此番实践从自知自反的内观内寻进而推至外在行动之上。自得本心,也就是找寻到放失的本心之后,便不会陷溺在外界环境的各种利欲之中,其行便会跟随着本心做符合仁义礼智的行为,这便是“由仁义行”,此番实践使得人进而从做“求”之工夫转为做存养扩充的工夫。
三、当代道德培养的“求”之工夫
当代社会,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信息传递呈现爆炸式特征,同时伴随着现代社会中大量失德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是人们的道德心放失于外界之中,不自知、不自反,沉溺在信息茧房中。这种陷溺必然会阻碍自身道德的培养与发展。面对当代道德培养的困境,孟子的“求”之工夫能够给予我们以深刻启发。面对本心的放失与陷溺,人们可以运用“求”之工夫来寻求本心。先是“自知”,通过“知言”工夫,明确知晓自身所陷溺于何种道德信息壁垒之中,知晓自己被限制在何种僵死的道德修养工夫之中。再通过“自反”,运用“反身而诚”之法,诚心诚意,破除壁垒,走出茧房,使得自身的道德修养工夫从僵死的转变成流动的,不再落在外界所规定的形式中,而是落在自身的本心流动上。最后,便是“自得”,自身以直觉之形式去行道德工夫,不再时刻做“求”之工夫,转而去做存养扩充本心的工夫,从而使自己的道德得以不断培养与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孟子心学中的“求”之工夫,是将知言、反身、自得融为一体的义之实践,是自身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从“应然”变为“实然”的工夫。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在享受各种新兴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个人道德的培养。若是道德心放失陷溺于信息与技术浪潮之中,要懂得寻求“求”之工夫,去寻回并不断培养自己的道德心。(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风格的风格探析

■ 李雪聪 代祖智

“风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多元领域,而置于个人层面则多指代个体的风度品格,即自我区别于他人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个人的装扮、行为以及观念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风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因时代背景、个人能力、理论学识的多元差异,形成的独具个性、特色鲜明的调研风格。尽管调查研究风格独具个性,但从中却凝聚了共产党人调查研究风格的精髓和共性。

一、身临其境,直插现场的唯实风格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基石,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调查研究。基层一线作为最大的实践场域和前沿阵地,亲临才知全貌,深入才知底里。中国共产党人,尤其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调查研究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收集一手材料,经过反复分析、比较和研究,得出结论。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党和国家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根本导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探究问题真实存在的情况,真正做到了“身入”基层、“心至”基层,设身处地地感受基层一线的所思所想所困。这种以身作则、率身垂范的唯实精神,深远持久地影响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人唯实风格形成的重要条件。此外,中国共产党人的唯实风格还体现在扎扎实实开展调研活动的实践中。调查研究者真正地走到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大街小巷以及农家小院,察民情、听民声,与人民群众密切交流,了解真实情况,反对一切不付诸行动囿于意识的空想,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避免浮在表面、流于形式”。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走秀调研,真正做到了投身基层、直插一线、贴近民众,为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唯实风格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动情晓理,与民共情的亲民风格
调查研究,亦或群众工作,始终坚持感情其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显著特征。2022 年中国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人民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成群众一员,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可见,调查研究不仅是一门研究工作,更是一门情感工作。调查研究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法宝,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情系人民的价值追求。在调查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情感融入“调”和“研”之中,秉持“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深切惦念和千钧职责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倾心交谈,建立了深厚情谊。在解决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的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的信任